

论俄国二月革命中的国家杜马及其作用

姚海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11)

摘要:在俄国二月革命的自发罢工和游行阶段,国家杜马既未特别关注也未直接参与运动。但在士兵起义开始后,国家杜马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直接领导起义,实际掌握政权,实行革命暴力,推进革命向前发展。从要求成立责任政府到采取旨在夺权和推翻旧制度的措施,国家杜马从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转变成为二月革命的领导机构。

关键词:俄国;国家杜马;二月革命;临时政府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0)01-0023-04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改变俄国历史发展方向、影响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至今仍吸引人们不断探索。二月革命期间的国家杜马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在尼古拉二世下令杜马会议延期后继续留在塔夫利达宫里的除了极右翼党派以外的杜马各党团,以及在27日下午成立的由各党团领导人组成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对国家杜马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反革命”,或者参与革命“不坚决”。这一问题值得重新认识和关注。客观反映国家杜马在二月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认识和理解二月革命的特点及其对俄国政局的影响很有必要。本文主要探讨2月27日开始国家杜马及其机构参与并领导革命的活动及其影响。

一、国家杜马对二月革命的最初反应

一般认为,彼得格勒2月23日(公历3月8日)开始的罢工和游行揭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26日以前,罢工和示威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俄国各政治力量及领袖都未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干预或引导运动。国家杜马此时正在进行2月14日开始的会议,也没有对此特别关注。

25日晚上和26日,沙皇政府基本平息了彼得格勒的骚动,并且决定将杜马会议延期到4月举行。但27日事态发生根本转折。自发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转变为以彼得格勒士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27日上午,在塔夫利达宫第11号房间举行了进步联盟执行局会议。李沃夫提出,杜马代表不解散,应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那样开会。罗将科认为,沙皇让杜马休会的举动排除了以和平方式平息冲突的可能性,但杜马不服从沙皇命令、不散去的做法也是一种反抗。在街上,动乱在蔓延。罗将科试图挽回局面,中午12点40分他再次给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希望沙皇采取政治措施解决危机。“政府完全无力平息动乱……近卫团的后备营都发生了叛乱,杀死了军官,他们站到人民运动一边……国内战争已经开始并正在蔓延。”他恳请尼古拉二世立即以最高宣言的形式宣布同意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杜马会议延期的命令,重新召集立法议会。

由于进步联盟领导人会议没有结果,随即举行了杜马各党团领导人会议,实际上是在出席进步联盟首脑会议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齐赫泽和克伦斯基,因为极右翼党派领袖在得到杜马休会的消息后大都离开了塔夫利达宫。杜马各党团领导人会议作出决定,服从沙皇关于杜马休会的命令,但为了防止崩溃,各党派要消除分歧、保持一致;成立一个委员会,杜马代表将无条件服从这个委员会。随即杜马党团代表会议决定,由进步联盟各党团领袖、右翼的舒尔金、左翼的齐赫泽和克伦斯基等12人组成“在彼得格勒维持秩序并与机构和个人进行联系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罗将科任主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比民主派政党发起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早,已经在夺取政权和推翻君主制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2月27日早晨,士兵起义刚刚开始,杜马代表就积极鼓动起义士兵到塔夫利达宫去。让“造反的部

收稿日期:2009-11-16

作者简介:姚海(1952-),男,江苏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队到杜马去”的主要倡导人是克伦斯基。下午1点,第一批起义部队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试图“搞清楚人民代表机关采取什么立场”,想知道“国家杜马是否愿意支持运动”。罗将科与代表会面时转告了杜马各党团领袖会议的决定“当前的基本口号是废黜旧政权并以新政权取代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杜马“将积极参与(运动),但为此首先需要秩序和安宁”。此后又有两批起义士兵和工人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要求杜马掌握政权、把罗曼诺夫王朝赶下台。两点钟,大约3万士兵来到塔夫利达宫,克伦斯基、斯科别列夫、齐赫泽与大家见面并发表讲话。斯科别列夫说,“旧政权垮台了……它还在抵抗……现在国家杜马正在开会。杜马代表还在动摇,他们还没有决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在向他们施加压力。同志们,请注意,建设新的国家是很困难的;组织新政府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这可能会拖一天、两天。要有耐心,首先要建立革命秩序”。克伦斯基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向士兵们宣布:“国家杜马与你们在一起!”^{[1] 351-452}下午两点到三点,起义士兵占领了塔夫利达宫。据2月27日唯一的报纸《彼得格勒新闻工作者委员会消息》对国家杜马所在地的报道“起义士兵的领导人撤掉了塔夫利达宫的警卫,自己接管了国家杜马的警卫任务,占领了国家杜马建筑物内的邮局和电报局,并在电报机旁布置了岗哨。”^{[2] 389}根据斯科别列夫的回忆,“我们立即组织了几个排的武装士兵来代替国家杜马原来的警卫。警卫没有抵抗,把自己的岗位让给了新的革命卫队”^{[3] 37-138}。克伦斯基后来也一再谈到,是他把革命部队带进了塔夫利达宫,带到了国家杜马。

二、杜马临时委员会领导起义

由于不断有新的部队支持国家杜马,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27日晚11点多,在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整个团支持国家杜马的消息后,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欣喜若狂。在这种情况下,罗将科决定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并向全俄各城市发出电报,宣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及其组成人员,并任命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起义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4] 301}。同时,罗将科给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和各战线、各舰队司令发去电报“1. 鉴于原大臣会议已停止履行管理职能,政府权力现已转归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2.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已着手建立正常生活秩序和管理首都,要求作战部队和舰队保持充分镇静并坚信同外部敌人斗争的共同事业一分钟也不会中断和削弱。军队和舰队将一如既往地坚强和勇敢。临时委员会在帮助首都部队、支持居民群众的同时,将尽快恢复后方的安定,重新开始政府机构的正确活动。希望每一位军官、士兵和水兵履行自己的职责!”^[5]

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很快成为革命中心。越来越多的起义士兵和工人聚集到塔夫利达宫,为杜马掌握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克伦斯基等人于27日午后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克伦斯基司令部”的非正式机构,担负起了领导起义士兵和工人同旧政权斗争的工作。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克伦斯基司令部”组建了最初的革命部队,将其“派往城市各个地方去发动尚未起义的部队”。司令部派兵占领了后备装甲汽车师的军火库,运出了近百挺机枪和近千支手枪,武装了起义士兵和工人战斗队。司令部还命令部队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战略要地等任务。到27日傍晚,“克伦斯基司令部”掌握了军官指挥系统的正规部队,成立了包括军事委员会在内的几个专门委员会。杜马军事委员会由“克伦斯基司令部”转变而来,由克伦斯基和罗将科领导,成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刚刚赶到杜马的第一后备团的200名军官和1.2万名士兵成为军事委员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军事委员会派出了由下级军官和士兵组成的侦察小组到宫廷广场、参议院广场、瓦西里岛、海军街等地方了解情况,还有几支50~150人的战斗分队奉命占领总军械库、中央电话站、火车站、彼得格勒省宪兵司令部等。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为组织起义、扩大军事力量规模而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2月27日,起义士兵人数从早上的1.02万人增加到中午的2.57万人,傍晚到6.67万人^{[1] 352}。

在军事委员会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27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也成立了起义指挥部,但“指挥部并未能对起义者进行任何实际指挥,一切都只限于谈论”。负责指挥部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回忆说“如果我们哪怕有一支联系紧密、保持纪律的部队就好了……没有火炮,没有机枪,没有指挥人员,没有通讯。”^{[1] 351}而且,指挥部的人员很快就解散了。晚9点左右,克伦斯基组织了20多名在杜马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军官到苏维埃起义指挥部,两个机构实现了最初的联合,以“联合起义指挥部”或“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这将有利于国家杜马在起义士兵和工人中扩大影响力。为了完全控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杜马临时委员会正式承认联合起义指挥部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任命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十月党人恩格尔加尔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

苏联史学界对此有不同说法,认为杜马夺取了“别人的”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层把军事委员会让与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等等。但实际情况是,军事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时间比苏维埃起义指挥部早4个小时,在杜马临时委员会领导起义的情况下,决定将军事委

员会与苏维埃起义指挥部联合,苏维埃起义指挥部才能够实质性地参与起义的具体工作。2月28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求允许全体选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进入军事委员会”。苏维埃起义指挥部没有对恩格尔加尔特的任命制造障碍,反而号召士兵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6]36},并以传单形式宣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组织军队并任命部队指挥员。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愿妨碍同旧政权的斗争,不希望士兵们拒绝保持牢固的组织和拒绝服从军事委员会及指挥员的命令。”^{[2]25}

三、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期间,在国家杜马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其派遣的政治委员组成的政权机构,杜马临时委员会是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这是革命俄国的第一个临时政权。

2月28日(公历3月13日)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关于政权的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4]302}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后,得到了自由派、民主派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以及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支持,还得到了主要盟国的承认。3月1日,法国和英国驻俄大使正式向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表示:“法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与俄国人民意志的真正表达者、唯一合法的临时政府——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建立事务联系。”^{[1]76-77}沙皇政权已完全不能控制局面,临时委员会实际上起着政府权力机关的作用。

杜马临时委员会对政府机关和管理部门的控制有以下几种形式:有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关的原大臣或负责人被免职或被逮捕,由政治委员全面接管其职权;有些部门的大臣和负责官员继续任职,但给他们派去了政治委员,必要时进驻警卫队和安全保卫人员;有些部门继续由原来的官员领导,杜马临时委员会没有派遣政治委员,但由杜马军事委员会派出安全保卫人员和警卫队;还有一些部门的大臣和主要官员被免职,但杜马临时委员会没有派遣政治委员,只是派出安全保卫人员控制其建筑物。

在利用原有大臣和高级官吏的同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杜马代表作为第一批政治委员接管内务部、军事部、财政部、司法部、最高法院、交通部、商业和工业部、农业部、邮政总局等主要政府部门和彼得格勒市政府。他们基本上都属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杜马代表,如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科夫、格隆斯基、卡卢金、格拉西莫夫、贝贝利亚耶夫、沃尔科夫、维诺格拉多夫,进步党人布勃利科夫、巴雷什尼科夫、季波夫,十月党人阿列弗耶夫、萨维奇、卡普尼斯特等。这些政治委员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应政府机关,开始发号施令。3月2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共任命38名政治委员,主要政府机关恢复了工作。

政治委员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获得了管理内部事务和推行政治改革的权利。同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对政治委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对重要部门则经常越过政治委员,直接下达指示和命令。例如,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科曾越过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政治委员古契科夫对其下属发号施令,事先未与他沟通;临时委员会将布勃利科夫派往交通部,经常就有关问题直接向其下属下达指示。

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控制政府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措施。这一制度保证了中央政府正常发挥职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这一制度不仅成为政府权力机关,而且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权力职能。

四、杜马临时委员会与革命暴力

从27日开始,起义士兵自发地逮捕和拘留旧制度的拥护者。许多官吏、军官、宪兵和警察被押解到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表示,逮捕行为是自发的,“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任何根据它的指示进行的逮捕”。但事实上,国家杜马27日成立了接收军事和民事官员委员会、初级侦查委员会等机构,具体负责逮捕、拘押等事务。27日下午3万人的起义部队来到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契科里尼大尉拒绝归附于起义士兵,并请求杜马领导人的保护。齐赫泽表示:“您自己选吧,或者是同革命部队站在一起,或者是被逮捕。”^{[1]382}罗将科和齐赫泽解除了不支持革命的官员的职务,发出了最早的逮捕令,但克伦斯基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罗将科证实:军人们认为“国家杜马代表克伦斯基的名字,把他作为行动的领导人”。舒尔金说:“武装人群带着‘要抓谁’的问题来找克伦斯基。”克伦斯基的特别任务是:逮捕一切最活跃的旧政权的走狗以保卫新制度免遭反革命之害^{[1]382}。

克伦斯基在回忆录中谈到27日下午3点过后与塔夫利达宫里的人见面的情况:“他们想知道,我们打算对沙皇制度的支持者做些什么,并且认为应该严惩他们。我解释说,他们中最危险的将会被抓起来,但人们无论如何不应自行执法。我要求不要造成流血事件。”“在回答谁应该第一个被逮捕的问题时,我说应该是前司法大臣、国务会议主席谢戈罗维托夫。我下令把他直接带到我这里来。”^{[3]338}因为谢

戈罗维托夫“不仅是最有害的、也是沙皇最能干的顾问”^[7]。君主主义者塔里贝格认为,“克伦斯基清楚该怎么做。失去谢戈罗维托夫,君主制就失去了一个最有经验的领导者……毫无疑问,谢戈罗维托夫很快就会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7]。晋季诺夫指出“逮捕前司法大臣谢戈罗维托夫是转折性的历史路标之一……这是以革命的名义、由革命实施的第一个逮捕行动,与此同时也是决定革命未来发展的一个姿态。”^[7]克伦斯基回忆说“通知终于来了,政府在马林斯基宫开会,派出了一支由装甲车护送的部队,带着逮捕全部内阁成员的命令。”^[3]^[40]28日凌晨,杜马临时委员会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给予他们逮捕沙皇政府大臣的权力。政治委员布勃利科夫在到达交通部后,要求交通大臣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立即到杜马向新政权效忠”,在遭到拒绝后,布勃利科夫当场将他逮捕。政治委员还有撤职和逮捕军队指挥员的权力。涅克拉索夫在派遣政治委员曼瑟列夫时指示,如果军官们助长反革命情绪,就逮捕他们^[8]^[10-11]。

军事委员会也实施逮捕行动。28日上午,军事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加尔特签署命令逮捕军区司令部反侦察局局长及该局军官。群众也经常在没有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独自实施逮捕行动。国家杜马对此并未采取措施加以控制。2月27日两位在奥布霍夫军工厂工作的炮兵将军被杀^[7]。在克隆斯塔德和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赫尔辛福斯,一些军官在街上、住宅和执勤地点被单位士兵或水兵杀害,舰队司令涅比宁本人也在3月4日被杀。由于存在着“军官解除士兵武装”的传言,军事委员会主席签署命令,“作为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我宣布,对此类军官,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至枪决”。该命令刺激了士兵对军官的暴力行动,他后来承认“这个命令成为指责我应对数十名军官在塔夫利达宫花园中被杀一事负责的理由。”^[9]^[177]

据卫生委员会统计,在革命的最初几天,仅在彼得格勒,被杀的军官就有60人^[10]^[273]。至于受伤者,塔夫利达宫27日有3个医疗站在工作。3月1日,在什巴列尔街和扎哈利耶夫街专门关押警察和宪兵官员的地方设立了4个医疗站。2月27日到3月13日,仅在塔夫利达宫登记在册的就有1962起请求医疗救助的事件,正式登记的有2421名伤病员^[11]^[370]。克伦斯基在3月5日发表的司法部长文告中说:“至今为止,临时政府旨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秩序的所有命令都是由人民不流血地执行的。”^[7]但实际上,已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在反革命者看来,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演变为全俄范围的暴行,即对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很多人的胸膛被染红……在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7]。

综上所述,2月23日到26日,杜马和各政党一样既未对革命特别关注也未直接参与;从27日开始,国家杜马便以临时委员会的形式直接领导了起义,推动了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争取建立责任政府到采取旨在夺权和推翻旧制度的措施,国家杜马已经从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转变为二月革命的领导机构。随着局势的发展,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在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终结罗曼诺夫王朝、成立临时政府等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1] Николаев А. Б.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в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Рязань, 2002.
- [2]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Ленинград, 1991.
- [3] Керенский А. Ф.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ры [М]. Москва, 1993.
- [4]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сверж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Москва, 1957.
- [5] Галушкин Н. В.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онвой [М]. Москва, 2004: 237.
- [6] Токарев Ю. С.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 марте – апреле 1917 г [М]. Ленинград, 1976.
- [7] Фомин С. Великая? Безкровная? Русская? Часть 2 [N].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7 – 02 – 16.
- [8] Мансырев С. П. Мо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J] // Страна гибнет сегодн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Москва, 1991.
- [9]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Во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 [J]. Клио, 2003(1): 20.
- [10] Ходнев Д.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запасной батальон Лейб – Гвардии Финляндского полка [J] // 1917 год в судьбах России и мира.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т нов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к новому осмыслению. Москва, 1997.
- [11] Николаев А. Б.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ласть: I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27 февраля — 3 марта 1917 года [М]. СПб, 2005.

责任编辑:时妍)